

迈向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

[日]上野千鹤子¹ 兰信三² 平井和子³ 著 陆薇薇⁴ 译

(1. 东京大学, 日本 东京 108-0014; 2. 上智大学 综合国际学部, 日本 东京 102-8554;
3. 一桥大学 社会学研究科, 日本 东京 186-8601; 4.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关键词: 战争与性暴力; 比较史; 慰安妇; 上野千鹤子

摘要: 战争与性暴力研究需要“比较史”的视野。是什么让受害者保持沉默? 具备怎样的条件她们方能开口诉说? 在比较的语境下, 我们可以思考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在哪里? 将可以言说的性暴力遭遇与不能言说的性暴力遭遇区别对待、加以分割的分割线在哪里? 为何如此划分? 历史上被创伤化、污名化的经历, 我们该如何诉说? 比较史能做什么? 能比较些什么, 又不能比较些什么? 通过回答上述问题, 希望能将战争与性暴力的研究向着比较史的方法论推进一步。

中图分类号: D669.68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19)06-0119-07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Sexual Violence in the War

Ueno Chizuko¹ Araragi Shinzo² Hirai Kazuko³ trans. LU Wei-wei⁴

(1.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108-0014, Japan; 2. Faculty of Global Studies,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102-8554, Japan;
3.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kyo 186-8601, Japan;
4.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Jiangsu Province, China)

Key Words: war and sexual violence; comparative history; comfort women; Ueno Chizuko

Abstract: Studies of war and sexual violence requires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history. What kept victims silent?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ill they speak up? In comparative context, we can examine what constitutes the particularities and generalities of the prostitution of comfort women imposed by the Japanese Empire. We can also scrutinize what distinguishes the describable experience with sexual violence from the unspeakable experience. We may also ask why we make the above distinction and how we should speak about the experiences that were traumatized and stigmatized in history. This article also considers questions related to what comparative history can and cannot help us achieve.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will help us move the studies of war and sexual violence towards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history.

作者简介: 1. 上野千鹤子(1948-), 女,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女性学创始人、NPO 组织 Women's Action Network(WAN) 理事长。研究方向: 社会学、性别研究。2. 兰信三(1954-), 男, 上智大学综合国际学部教授。研究方向: 历史社会学、战争社会学。3. 平井和子(1955-), 女, 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非常勤讲师。研究方向: 近现代女性史、性别史。4. 陆薇薇(1980-), 女,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日本社会文化、性别研究。

* 本文为上野千鹤子、兰信三、平井和子所著『はじめに 戦争と性暴力の比較史へ向けて』一文的译文, 原文为上野千鹤子、兰信三、平井和子编『戦争と性暴力の比較史へ向けて』(岩波書店 2018 年)一书序言。Copyright©2018 by Chizuko Ueno, Shinzo Araragi, Kazuko Hirai.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一、源于亚洲的“战争与性暴力”研究

“战争与性暴力”研究源于亚洲,始于1991年。曾为“慰安妇”的韩国女性金学顺,挺身而出实名控诉日本政府,与其他匿名的原慰安妇、原军人及其家属一同要求日本政府给予损害赔偿,这一事件标志着战争与性暴力研究的开始。虽然在此之前,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原负责人尹贞玉,曾边听边写地记录过慰安妇问题,千田夏光^[1]、金一勉^[2]等人也曾就慰安妇问题撰写过纪实文学作品,然而,直到慰安妇问题和战时性暴力问题成为历史学的正统研究对象,才出现了1991年划时代的一笔。之后,源于亚洲的“战争与性暴力”研究,如星星之火蔓延至全球各地,世界各国纷纷展开对战时性暴力实际情形的研究。上述积累,使我们的比较史研究成为可能。

25年后,有两部著作开拓了“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这一视角。一部是玛丽·路易丝·罗伯茨(Mary Louise Roberts)所著的《士兵与性——二战中美国大兵在法国干了什么?》^[3],另一部是雷吉娜·慕赫汉森(Regina Mühlhäuser)所著的《战场上的性——苏德战争下的德国士兵与女性》^[4],它们被翻译成日语在日本出版发行^①。前者描绘了1944年诺曼底登陆战中以解放者姿态进军法国的美国士兵,与当地法国女性之间发生的强奸、买春卖春、恋爱中自愿性行为等多样化的性行为;后者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1941-1945年)中,攻入苏联地区的德军与战地、占领地女性之间的各种性关系,包括强奸、性交易、自愿性行为、怀上及生育德国士兵的孩子等情况。

这两部推动了“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的著作与日军慰安妇问题密切相关。慕赫汉森曾于2000年作为志愿者参与过女性国际战犯法庭^②;而罗伯茨的著作被介绍到日本有着复杂的内情,它的介绍人竟是声称士兵需要“慰安”、肯定“慰安所”存

在的必要性的原大阪府知事桥下彻^③。

在“性暴力”这个容易被污名化的主题中,想要了解事实真相极为不易。在这样的形势下,能将与美国、法国、德国相关的经历作为事实发掘出来,本身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两部著作还有一个共通之处,它们都是在从强奸、买春卖春到恋爱的多义性和连续性中把握性暴力问题的。

历史学无法如实验室般重现原况,“比较”故而成为格外重要的方法。通过比较,特定事例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事例的共同点都会变得清晰。在比较的语境下,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在哪里?将可以言说的性暴力遭遇与不能言说的性暴力遭遇区别对待、加以分割的分割线在哪里?为何如此划分?我们该如何诉说历史上被创伤化、污名化的经历?此外,比较史若被误用,可能会被“军队性暴力普遍论”裹挟,成为帮凶。比较史能做什么?能比较些什么,不能比较些什么?通过回答上述问题,将战争与性暴力的研究向着比较史的方法论推进一步,是本书希冀解决的课题。

二、记忆与证言的拷问

战争与性暴力研究面临的最大阻碍是记忆与证言的问题。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鲜有人将性暴力问题作为事实加以记录留存。因为对加害者而言,那是污点;对受害者来说,则是创伤与污名的叠加。而且,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还存在极为显著的认知差异(perception gap),这种经历的不对称性是性暴力问题的特征所在。尤其是在现有的社会性别规范下,由于性别规范对受害者的污名化,受害者大多无法发声。受害者的沉默使得加害者免受责罚,也令受害者一直不能获得救助。于是,一系列需要应对的课题摆在我们眼前。例如,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使性暴力受害者开口诉说?能够让其作证的条件是什么?哪些内容是可以被讲述的?哪些内容是不

①慕赫汉森的著作尚未被翻译成英语,日文版译著占了先机。

②效仿“罗素法庭”这一民间法庭的做法,2000年12月,日本、韩国、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团体在东京联合举办了战犯法庭。该法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国际女性主义法学家的参与,女性得以担任法官的职务,实现了对裕仁天皇的有罪判决等。

③2013年,时任大阪市长的桥下彻声称“慰安妇制度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鼓吹其合法性,他的言论受到旧金山市议会的批判。在向旧金山市议会呈交的阐释信中,桥下提到了罗伯茨的这部著作,以此为契机,罗伯茨的著作被译成日语。罗伯茨著作的译者佐藤文香在其译著的“解说”部分介绍了这一经过。

可以被讲述的?作为倾听者的我们该如何参与其中?该如何对待受害者所讲述的内容?

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应该会给以下三个领域带来挑战。

第一是对战争研究的挑战。长期以来,战争中的性暴力被认为是无法控制的男性性欲的发泄,或无法统一管理的战争时期士兵的脱轨行为。战争是所有异文化接触中最暴力、最具强制性的一种接触。正因如此,战争屡屡被比作“强奸”。不,不仅是隐喻,如字面般赤裸裸的“强奸”行为总是跟随战争左右^④。然而,一直以来,战争中的性问题因为“战士的名誉”而无法言说。从有组织的嫖娼到强奸罪行,以战时性暴力为主题的研究,往往会激怒军队与士兵^⑤。但随着战争与性暴力研究的推进,事实逐渐明朗起来,性暴力并非战争过程中士兵偶然发生的脱轨行为,从有组织的性暴力到偶然发生的性暴力,从军队实际参与的性暴力到军队默许的性暴力,性暴力问题中存在着多样性。研究还表明,性暴力会被作为军事战术的一环加以利用^⑥,除了对“敌方”实施性暴力之外,为了“我方”士兵的身体管理,也会动员女性献身。在这些研究成果陆续涌现之后,性暴力成为战争研究不可缺少的一个主题。为日军战斗力的存续做出“贡献”的慰安妇,被视作军需物资进行转移,然而在正式的调动记录中却没有关于慰安妇的记载,她们也没有被供奉于靖国神社之中。尽管加害者与受害者均保持缄默,但性暴力问题不会因此消失。同时,我们还应质问,为何一直以来作

为官方记忆的军事史,压制了性暴力的历史?

第二是对历史学的挑战。慰安妇证言登上历史舞台的20世纪90年代,恰是历史学中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之场》^⑦等记忆论方法登场的时期。这被称作历史学的“记忆论转向”。记忆中存在被讲述的经历和最终没能被讲述的经历两种。正因如此,所谓历史,不仅是记忆,而是“选择性记忆与忘却”的集合。在“选择性忘却”之中,存在“碍事的真实”,即加害的记忆及被害的创伤记忆。诺拉把历史遗迹、博物馆等作为“记忆之场”提出,是出于对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国民记忆传承的担忧,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幸存者正在不断地老去。历史学不得不直面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亲身经历过该历史事件的一代人,将如何传承国民记忆?

由建构主义引发的诸如“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等认识论的转型,带来了历史学的“记忆论转向”^{⑧⑨}。这一“记忆论转向”改变了历史学中“证言”的位置,强化了口述史的重要性。“记忆”与“证言”被导入历史学研究,一方面,它们丰富了历史学的内涵,使其变得更加多元;另一方面,它们引发了关于记忆与证言的种种复杂问题。

“记忆论转向”将历史看作记忆的集合,这招致诸多历史学者的强烈反抗。他们乃是实证科学之信徒,是忠于“史料”(evidence)和“事实”(fact)的专业人士,所以无法接受“历史是叙事”这种说法。在文献资料中心主义的实证主义史学看来,“证言”长期以来不过是用以补充文献资料的辅助资料^⑩。近年

④即使众所周知强奸、嫖娼等事实存在,军队也从未正式承认过,更不会将其写入战史。强奸民间人士的行为偶尔也会成为士兵违反军规进行处罚的原因,但他们大多却免于责罚。至少从表面上看,性暴力一直是军队不愿承认、深感耻辱的罪行。这也成为不存在战时性暴力记录或将相关记录抹去的理由。

⑤罗伯茨的著作出版之后,美国退役军人极为恼火。此外,揭露澳大利亚军队占领南方阵线后将日军慰安所挪为己用的田中利幸,遭到了澳大利亚退役军人协会的责难。由此不难看出,士兵们将性暴力视作“不光彩的行为”。参见[日]田中利幸『知られざる戦争犯罪——日本軍はオーストラリア人に何をしたか』,東京:大月書店,1993年。

⑥在“波黑战争”中,塞尔维亚一方有组织地使用了被称为“民族进化”(ethnic cleansing)的作战方式,他们设立了强奸中心,拘留被塞尔维亚士兵强暴的穆斯林女性,直至她们错过堕胎时间。

⑦针对那些被书写记录的历史,出现了“口述史”(oral history)、“生活史”(life history)等称谓来称呼边听边写的历史。然而近来有观点指出这些称谓存在不妥,叙述并不仅仅是“口头讲述的‘历史’”。因为,所谓证人,并非重复讲述相同内容的录音机。伊丽莎白·汤金(Elizabeth Tonkin)把这一现象称作“说书谬论”(talking book fallacy)。参见Tonkin, Elizabeth, *Narrating the Pas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O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櫻井厚等学者则把“生活史”(life history)改称为“生活经历”(life story),参见[日]櫻井厚『ライフストーリー論』,東京:弘文堂,2012年。

来,证言的价值不断提升,但终究还是与文献资料相对应、用来证明“事实”的“证言”,并非在语境中生成、变化的“记忆”。因此,所谓“记忆”,超越了历史法庭上的“证言”。

如果说个人的记忆是一种叙事,那么,作为记忆的集合被书写的历史也是一种叙事。由此,诞生了将官方历史(official history)的叙述称作“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的概念。宏大叙事概念揭示出多重历史叙述(multiple histories)的可能性,即历史叙述中还存在替代性叙事(alternative narrative)、对抗性叙事(counter narrative)等其他叙事方式。如此,有各种各样叙事的“历史”,与“文学”并无二致。而这种历史相对主义论,最能触犯那些效力于“唯一真实”的历史学家的逆鳞。

我们必须记住,多重历史叙述并非由权力支配方,而是由被压制的一方创造出来的。为了提出“对抗性的历史”“另一个历史”,来对抗所谓“官方历史”,少数派使用了“叙事”(口述)的概念。因为与官方历史不同,他(她)们没有文献资料,没有被书写记录的历史。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0世纪70年代由第二波女性主义引发的女性史热潮,当时口述历史盛况空前。在没有文字和记录的女性们之中,“边听边写”这种方式本身既是一种替代性(alternative)的历史实践,也是一种女性运动^⑧。

第三是对性别规范的挑战。这些规范具有性别不对称性,对女性进行了压迫。我们之所以无法取得性暴力受害经历的相关证言,是因为性别规范让那些受害者沉默不语。性暴力问题中存在着不对称性,作为加害方的男性的行为被合理化,使其免于惩处,而作为受害方的女性却被迫背负起从起因到结果的所有罪责。将父权制的性别规范内化了的受害者,会产生强烈的耻辱感,从而大多选择了沉默。当性暴力受害者揭发加害者的罪行时,人们往往归咎

于女方的疏忽大意,这实质是因为在父权制性别规范下,女性被建构成为男性的“引诱者”。因此,受害者会遭遇对其“过错”(穿着暴露、一个人跟随男性回家等)进行谴责的二次伤害。不仅如此,她们还会被要求证明自己曾彻彻底底地反抗过(无责性)。哪怕是在被手持凶器的人胁迫、失去反抗能力的情形下,她们也会被要求以“咬舌自尽”的方式来进行反抗。因为,女性的贞操比生命还要可贵。女性若不能提供反抗的痕迹(被殴打或伤害留下的伤痕),就会因此被看作“同意”了性暴力。倘若被稍许怀疑是否有“同意”的倾向,女性的贞操就会变得可疑。而且,一旦受到性暴力的侵害,不论其是否“同意”,女性都会被视作“瑕疵品”,被从受到父权制保护的指定席位中驱逐出去。

除此以外,父权制的性别规范还携有更加巧妙的“性的二重标准”装置,它成功地对女性进行分隔支配。这个装置将妻子、母亲、女儿与娼妇分隔开来,歧视娼妇。前者被强制要求保持“贞操”,后者则被打上“沦落”的烙印。哪怕只有一丁点“同意”的征兆,都足以成为女性被从受到父权制保护的指定坐席中驱逐出去的理由,而后者(娼妇)不论被如何对待,都无法吐露任何怨言。如果“同意”伴随有一定的金钱回报,那么“肮脏的”不是付钱的男性,而是收钱的女性。被要求保持贞操的前一类女性,也是“娼妇歧视”的支持者,从而衍生出“战场后方的忠贞女”与“前线的慰安妇”之间的对立。

三、叙述的生产与消费

记忆与证言的问题还把我们导向从属于其中的种种复杂问题。

首先是能够获取证言的条件。普伦默(Ken Plummer)^⑨对创伤化、污名化的少数群体的叙述展开研究,他指出,叙述在一定的语境下会被集体性地反复实践,并同时趋向定式化(formulation)。叙述的

^⑧建构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是认识论层面的范式转换,同时也是一种工具,它既可能为少数人谋取利益,也可能为多数人的统治贡献力量。理论既会被善用也会被滥用,但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该理论作为工具拥有极高的普遍意义。历史相对主义理论的倡导者未曾料到,这一理论结果会被历史修正主义者胡乱使用,然而,我们不能将责任归咎于理论本身。因为即便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被提出的多文化主义理论,也时会被新自由主义者滥用。参见[日]塩原良和『ネオ・リベラリズムの時代の多文化主義 オーストラリアン・マルチカルチュラルizmの変容』,東京:三元社,2005年。

定式化一方面使得叙述者无需承担责任,拓展了叙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有诱导叙述趋向固定形式的作用。经历的言语化,是包括“听者”在内的相互交流的行为,它绝非属于个人。

其次是听者(audience)的存在。当叙事理论进入文学研究领域,“读者”被凸显出来。文本不是独立不变的,它被每一位读者再生产及消费的存在。于是,文本不再属于作者,它属于作者和读者双方参与而形成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文字文本尚且如此,那么在口头文本的生产与消费中,听者这一主体的参与便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将创伤化、污名化的经历言语化时,绝不能缺少处处留心、善于共情的听者。所谓证言,是叙述者和倾听者共同制作的产物,在这种对话式、合作式的文本生产过程中,口述史研究领域有过许多值得关注的争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研究表明,听者这一主体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存在,其既可能解放受害者的的心声,也可能榨取受害者的言说^⑨。

最后是受害者的行为主体性(agency)问题。无论在多么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之下,受害者也不单单是无力的、被动的存在。无论可选项多么贫乏,受害者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女性史面临的挑战,是在历史中重新发掘那些无力的、牺牲者形象的女性的主体性(restore women's agency to history)的实践。这种实践具有双重作用,它一方面把女性史从“受害者史观”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却悖反地揭露出女性的加害性和共犯性。受害者与加害者无法截然分离。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曾说“对抗即服从,服从即对抗。”^⑩在此情形下,受害者在身为受害者的同时可能成为加害者,而加害者同样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综上,“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需要细致而缜密的分析,以应对复杂的语境和状况。我们还需要这样一种叙述法,即“把复杂的事物就这么复杂地讲述出来”。因为,人与人创造的历史,本就是复杂的。

四、本书的构成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编者与执笔者曾数次研讨,努力共享问题意识。本书的构成如下所述。

序言由编者之一的上野千鹤子撰写,她就“战争与性暴力比较史的视角”展开论述,揭示出理论性概念和比较史的可行性,这是本书一以贯之的基本观点。

第一部分为“被叙述的‘慰安妇’”。日军慰安妇问题是“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的起因,本部分旨在梳理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先行研究并提出研究课题。如“被叙述的慰安妇”这一标题所示,本书的重点不在于弄清历史“事实”(如:何为慰安妇制度?慰安妇是谁?慰安妇在哪里?慰安妇有多少人?)而在于阐明“证言”和“记忆”的相关问题(如:慰安妇问题是如何被讲述的?是什么使得这样的叙述成为可能?又是什么压制了叙述?哪些内容被讲述了?哪些内容未被讲述?)第一章山下英爱的《听取、记录韩国慰安妇证言工作的历史——有关记忆与再现的尝试》一文,以慰安妇问题判决依据的幸存者“证言”为基础,在历史经过中论述以下问题:“证言集”是如何被数次制作的?在制作过程中“边听边写”的记录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触及口述史方法论的核心。第二章木下直子的《“强行带走”话语与日本慰安妇的不可视化》一文,揭示出慰安妇叙述的双重性,它一方面让日本慰安妇缺席的问题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又压制了日本慰安妇的声音。第三章冈田泰平的《日军慰安妇制度与性暴力——强制性与合法性的纠葛》一文,对菲律宾宿雾岛的战犯判决资料进行了细致研究,在此基础上,从“记录”与“记忆”之间,探讨了以下问题:何为犯罪?何不为犯罪?军队的“常识”将哪些性暴力定罪又让哪些性暴力免罪?第四章平井和子的《士兵与男性气概:去或没去“慰安所”的男性士兵》一文,基于收录在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大量士兵回忆录,研究买春一方的士兵如何看待“慰安妇”及自己在“慰安所”的经历,从而揭示出土兵与慰安妇

^⑨慰安妇受害人的证言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慰安妇证言的官方化,使得原本在边听边写过程中获得的证言的多样性逐渐消失。可以说,官方化的历史就是证言多样性消失的过程。

经历的不对称性,并诘问军队与征兵制形塑的“男性气概”。

第二部分为“无法叙述的记忆”。本部分聚焦那些在同时期发生的性暴力受害事件中迄今一直被压制的叙述,通过不为人知的一面来揭示以下问题:是什么使叙述成为可能?又是什么压制了叙述?第五章茶园敏美的《名为“性”的接触区——从日本被占领的经历谈起》一文,依据极为珍贵的仅存的访谈资料,分析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和当时女性的生存策略。日本政府在战败后立即设立了占领军慰安设施,修筑起所谓“性的防波堤”,而女性在被封锁之后只能作为占领军慰安妇(pangpang)生存下去。第六章猪股祐介的《打破沉默的性暴力受害者——解读伪满归国人士的牺牲者话语》一文,阐释了无法获取女性受害者本人的证言,致使该段历史长期空缺的原因。从伪满洲国撤回日本时,伪满洲国移民女性遭受了性暴力,这一事实虽然通过第三者的证言及传闻早已为人所知,然而受害者自身才刚刚打破缄默。第七章樋口惠子的《归国女性的“非法妊娠”与战后日本的“堕胎自由”》一文,呈现了往往会被人们忘却的性暴力会导致女性怀孕、生育的事实。在撤回日本的女性中,有的因为遭受性暴力而怀孕。当归国船只抵达港口时,迎接她们的是违法从事堕胎手术的医生,以及有意提供堕胎服务的行政势力。樋口指出,让当事人一生保持缄默的这段黑暗归国史,却讽刺地推进了日本战后的“堕胎自由”。第八章姬冈とし子^⑩的《纳粹德国的性暴力是如何走向不可可视化的——以强制收容所内卖淫设施为中心》一文,对比日军慰安妇的研究,提出疑问:德国战后为何没有将性暴力问题化?若要让性暴力这个与社会性别相关的罪行成为议题,会遇到怎样的阻碍?需要怎样的条件?姬冈基于同样是战败国、加害方的比较史视角探究了这些问题。

第三部分为“向历史学发起挑战”。本部分直击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第九章成田龙一的《性暴力与日本近代史学——“相遇”与“错过”》一文,批判自身所属的日本近现代史学界未能将“战争与性暴力”作为课题,并反思其原因。1991年的金学顺事件震惊学界,日本女性主义研究因为没有把慰安妇问题作为课题而遭到批判。成田认为,日本近现代史学界也应该背负相同的罪责。同时,成田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记忆与证言的相关问题为日本近现代史学带来了什么?未曾带来什么?其原因何在?第十章兰信三的《采访、记录战时性暴力受害事件——以〈黄土村的性暴力〉为线索》一文,试图超越性暴力的叙述方式,探讨更广阔的口述史问题,研究在历史学中尤其注重证言价值的口述史,是如何“听取”证言的,并通过这一研究反思口述史作为一门学问的可能性。换言之,其课题是要跨越历史学与口述史之间不幸的分离与截断。第十一章佐藤文香的《战争与性暴力——有关叙述的正当性》一文,探讨了在强奸、卖淫、恋爱这一连续性战时性暴力中的叙述条件问题:在此过程中什么是可以被讲述的?什么是不能被讲述的?是什么赋予了叙述者可以讲述的正当性?叙述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作为听者一方的社会,会通过生产特定的叙述和反过来压制其他叙述,来实现对叙述的控制。记忆与证言是将历史中被创伤化、污名化的经历进行“原声再现”的尝试,我们不仅要知道其中存在什么,还需要知道其中缺少了什么。作为听者的我们,同样是导致那些声音缺席的“共犯”。

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才刚刚拉开帷幕。其中蕴含着诸多课题,涵盖范围广阔,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本书无法将所有问题悉数囊括,只希望能通过对方法论课题的挑战,为开辟比较史的视角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 [1][日]千田夏光. 従軍慰安婦 “声なき女”八万人の告発[M]. 東京: 双葉社, 1973.
[2][日]金一勉. 天皇の軍隊と朝鮮人慰安婦[M]. 東京: 三一書房, 1976.

^⑩遵照作者的意见,保留人名中假名的写法,不译作汉字,音为 toshi。

- [3] Roberts Mary Louise. *What Soldiers Do: Sex and the American GI in World War II Franc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日]佐藤文香監訳/西川美樹訳. 兵士とセックス 第二次世界大戦下のフランスで米兵は何をしたのか? [M]. 東京: 明石書店 2015.
- [4] Mühlhäuser Regina. *Eroberungen: Sexuelle Gewalttaten und intime Beziehungen deutscher Soldaten in der Sowjetunion, 1941–1945* [M].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10, [日]姫岡とし子監訳. 戦場の性 独ソ戦下のドイツ兵と女性たち [M]. 東京: 岩波書店 2015.
- [5] Nora Pierre ed.. *Les Lieux de Mémoire* [M]. Paris: Édition Galli-mard, 1984/1986/1992, [日]谷川稔監訳. 記憶の場 フランス国民意識の文化 = 社会史(全3巻) [M]. 東京: 岩波書店 2002/2003.
- [6] [日]上野千鶴子. 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 [M]. 東京: 青土社, 1998/新版東京: 岩波現代文庫 2012.
- [7] [日]上野千鶴子編. 構築主義とは何か [M]. 東京: 勁草書房 2001.
- [8] Plummer Ken.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日]桜井厚ほか訳. セクシュアル・ストーリーの時代 語りのポリティクス [M]. 東京: 新曜社, 1998.
- [9] Spivak Gayatri 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日]上村忠男訳. サバルタンは語ることができるか [M]. 東京: みすず書房, 1998.

责任编辑: 绘山

(上接第 118 页)

- [2] Joan L..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French Revolution* [M].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3] Dena G.. Public Sphere and Private Life: Toward a Synthesis of Current 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es to the Old Regime [J]. *History and Theory* 1992, 31(1).
- [4] Jürgen H.. *On Society and Politics: A Reader*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 [5] Jürgen H..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M]. trans. Thomas Burge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 [6] Lyon Janet. Sociability in the Metropole: Modernism's Bohemian Salons [J]. *ELH* 2009, 76(3).
- [7] Dodge L. M.. *Movers and Shakers* [M].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1985.
- [8] Rodriguez S.. *Wild Heart: A Life: Natalie Clifford Barney and the Decadence of Literary Paris* [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3.
- [9] Mellow J. R.. *Charmed Circle: Gertrude Stein and Company* [M]. New York: Praeger, 1974.
- [10] Henri L.. Lost in Transposition—Time, Space and the City [A]. *Writings on Cities* [M]. trans. and ed. Kofman and Lebas. Oxford: Blackwell, 2000.
- [11] Gertrude S.. *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M].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80.
- [12] [美]杰克·弗莱姆著 程文华、陈松松、段友国译. 马蒂斯与毕加索: 画坛双擎的对抗与友谊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 [13] [美]蒂姆·阿姆斯特朗著 孙生茂译. 现代主义: 一部文化史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4] [美]露西·丹尼尔著 王虹、马竞松译. 格特鲁德·斯坦因评传 [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5.
- [15] Carolyn S.. *Jessie Redmon Fauset, Black American Writer* [M]. New York: Whits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 [16] Radclyffe H.. *The Well of Loneliness* [M]. New York: Doubleday, 1928.
- [17] Natalie B.. *Adventures of the Mind*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8] Elaine S..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 [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9] Erving G..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M].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59.

责任编辑: 怀明